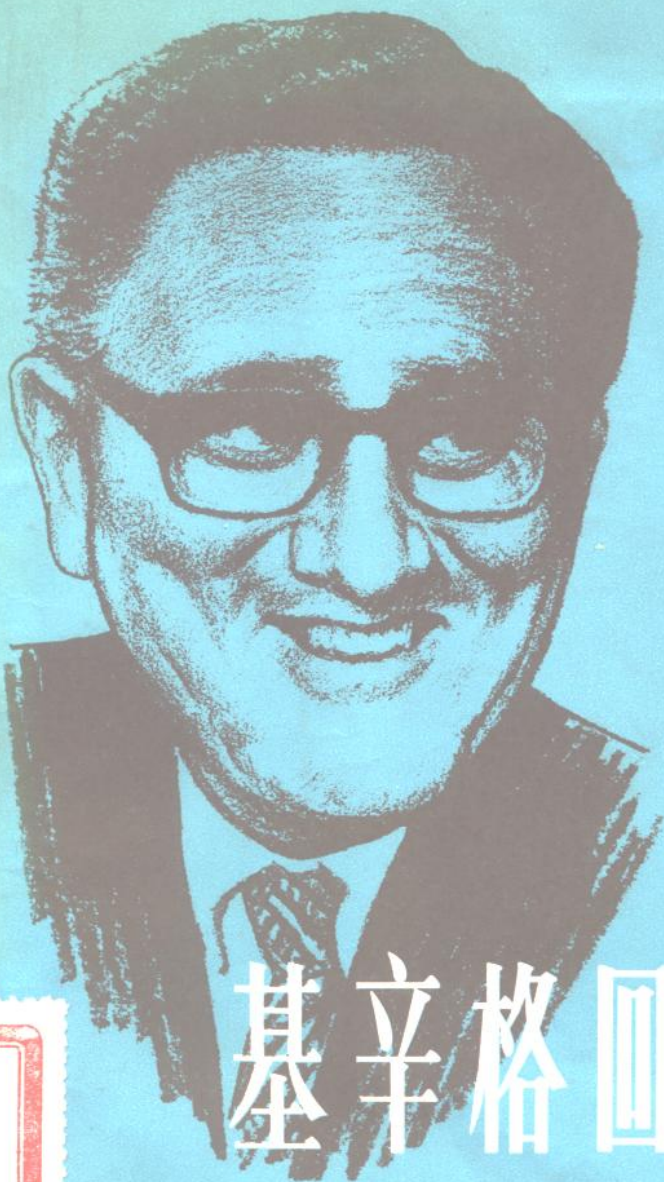




基辛格回忆录

第二卷：动乱年代

1973—1974

(节译本)

K837.127/3

基辛格回忆录第二卷

动 乱 年 代

1973 — 1974

(节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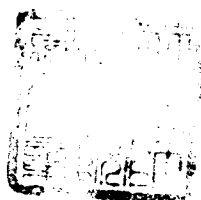
〔美〕亨利·基辛格 著

张志明 吴继淦 梁立礼 译

1430/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2076



世界知识出版社

862076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 Toronto

● 本书根据美国《时代》杂志1982年3月1日、8日和15日三期摘要连载的《动乱年代》译出。

封面设计：孙 政

基辛格回忆录第二卷
动 乱 年 代

1973—1974

(节译本)

【美】亨利·基辛格 著

张志明 吴继淦 梁立礼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5 插页：2 字数：89,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0

书号：3003·1644 定价：0.62元

译 者 的 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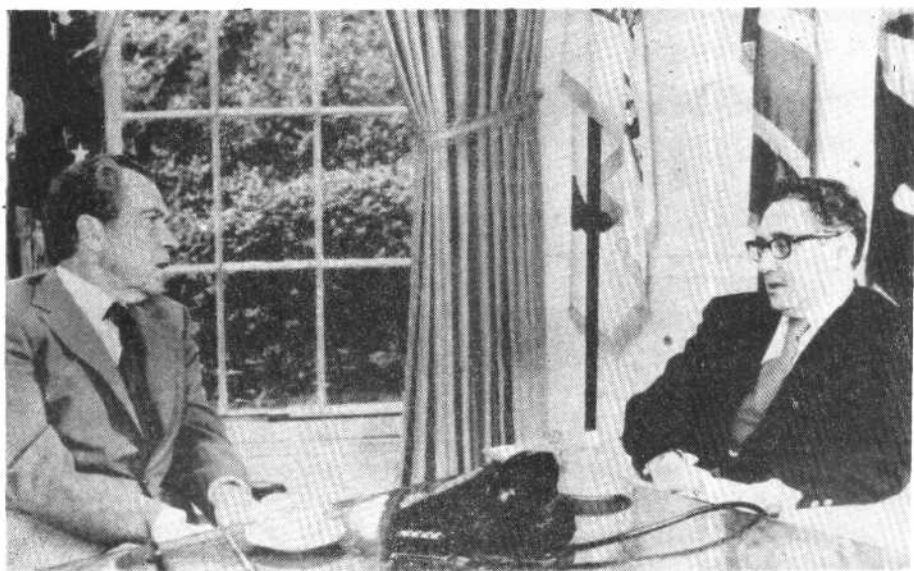
《动乱年代》是亨利·基辛格的第二卷回忆录，主要记述1973年至1974年在尼克松总统领导下担任国务卿期间，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外交活动和一些内幕情况。

全书主要内容为：“水门事件”；中东战争和穿梭外交；越南停战和河内之行；调解柬埔寨战争；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两次会谈；石油危机及其解决办法；智利阿连德总统倒台；以及尼克松在辞职前后的一些事态发展。书中还记载了基辛格和当时的一些世界领导人物的会晤情况及对他们的评价。

这个节译本是根据美国《时代》杂志1982年3月1日、8日和15日三期摘要连载的《动乱年代》译出的。



本书作者亨利·基辛格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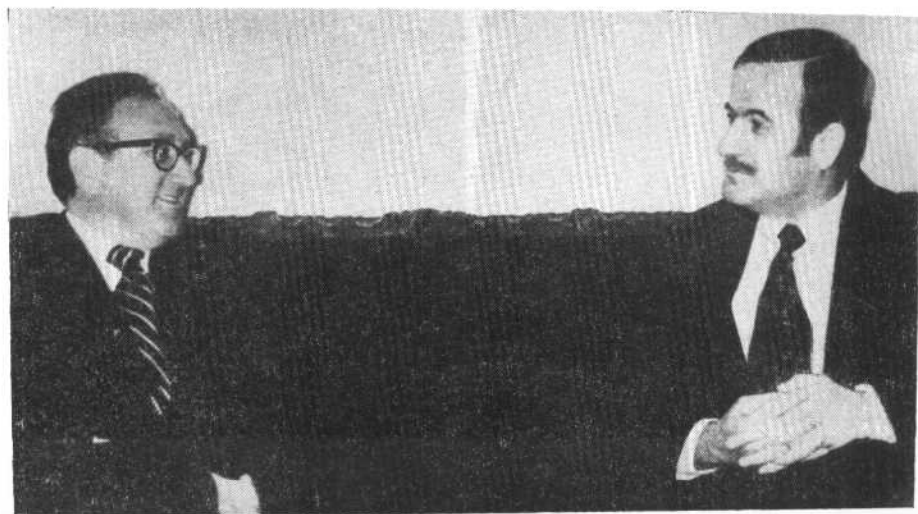
基辛格和尼克松在一起。



1973 年 9 月，基辛格宣誓就职后的第一天在国务院办公厅里。



1973年10月萨达特和他的助手们
在一起研究军事部署。



1974年1月20日基辛格在大马士革
同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在一起。



1974年1月18日在101公里处签署
埃—以脱离战斗协议。



1973年5月，基辛格同勃列日涅夫
在狩猎地扎维多沃的狩猎台旁。

目 录

动乱年代	1
政府遭围攻	1
中东战争	5
与苏联摊牌	22
拯救一支受围困的军队	35
穿梭外交的诞生	42
前往大马士革	50
“水门事件”	61
山雨欲来风满楼	62
“水门事件”的起因	67
“对上帝的恐惧”	74
录音带和窃听	80
力挽狂澜	84
一个政府的死亡	87
冒烟的枪	91
道路的尽头	103
尼克松：无立足之地	106
新交宿敌	112
和勃列日涅夫一起狩猎	113

同毛泽东睿智的对话·····	117
缓和的困境·····	126
军备控制之争·····	132
1974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137
人物素描和随感 ·····	140
尼克松的“德国佬”·····	140
厉害的黑格·····	143
尼克松与犹太人·····	146
费萨尔的坎坷行程·····	148
谈，谈，谈·····	150
出乎意料的奖金·····	150
随感·····	151

动 乱 年 代

政府遭围攻

1973年8月，加利福尼亚天气晴朗。每天清晨，我丢下公文，坐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我办公室后面的平台上，遥望着朝阳冲开洋面上的薄雾。偶尔地，我看到一个瘦小的、肩头有点佝偻的身影踟躅在峭壁的边缘。峭壁的那一边便是海滩和太平洋。在这宁静的环境中，理查德·尼克松正在忍受着他政治生涯中漫长的最后折磨。除了与世隔绝的圣克利门蒂之外，全国都在风传着他是否能继续担任总统的猜测。尼克松本人似乎沉着镇静。他很少谈到“水门事件”——从来不明确谈论。只有非常了解尼克松的人才能从他神思恍惚和闷闷不乐的神态中看出他内心深处的剧烈不安。

8月21日，我和我的孩子们应邀在尼克松官邸“太平之家”的游泳池里游泳。不一会，总统也来到游泳池同我们一起游泳。稍后，他提议到浅水区去谈一谈他定于第二天上午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我坐在游泳池的台阶上；总统仰面飘浮在水上。突然，他既不热情也不激动地说：“我将在记者招待会一开始宣布任命你为国务卿。”这

是他第一次对我谈起这件事。

当然，这并非我第一次听到此事。“水门事件”已使白宫助理们迄今为止的显要地位难以保住。我在政府其他人员中的影响取决于总统的权威，而总统的权威正随着各种庸俗行为（某些是无聊的，某些是非法的）的不断揭露而江河日下。5月份被召回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的亚历山大·黑格早在夏初就曾对我说过，除了任命我为国务卿之外，别无其他解决办法。当时的国务卿威廉·罗杰斯预定要在夏末离职。尼克松从来就不想有一位强有力的国务卿。假如他准备改变这一原则，这表明他已是多么一筹莫展了。

第二天上午，我坐下来观看记者招待会的电视实况转播。正当尼克松开始讲话时，我的好友、挪威女演员莉夫·乌尔曼从奥斯陆打来了电话。我拿起话筒解释当时我不能与她讲话的原因。我刚刚挂上电话，尼克松宣布我任国务卿的简短讲话也结束了。在宣布罗杰斯辞职以后，尼克松提名我接替他的职务，并说，“我认为，基辛格博士担任这一职务的资格是众所周知的。”他没有详谈我的资格是什么。就这样，我碰巧没有听到自己被提名为国务卿的讲话。

本来可以叫人高兴的时刻却充满了深切的忧虑，因为本届政府正遭到围攻。我们正在不遗余力地防止美国的外交政策随着尼克松总统权力的逐渐瓦解而分崩离析。我得到了一个我从来想象不到的职务；然而我却没

有闲情逸致来庆贺这件事。我无法驱散萦绕在我心头上的痛切之感：正当我飞黄腾达之时，就在几米之外，理查德·尼克松却如此孤单和备受折磨，在那冷若冰霜的外表下，还有一种恐惧之感。

一切都与我们在1973年早些时候的期望大不相同。一届总统任期开始就展现了如此灿烂的外交政策前景，这还是少见的。1月份，10年来的国内尖锐分裂看来将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而终止。1972年11月尼克松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已给他提供了一次不寻常的机会来医治国家的创伤。也许我们想得太好了，但我们深信，现在有许多因素有助于在一些方面展开创造性的外交。

至于我，在1973年伊始，就同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内的种种斗争没有什么瓜葛而感到很超脱，因为我已决定于当年年底辞职。我感到可以自在地这样做了，因为我看到了外交政策的新阶段，不再被蒙上一场分裂斗争的阴影，同时还相信，尼克松总统第一届任期的那种拜占庭式的行政程序非结束不可。权力不应再集中于撇开政府其他成员秘密办事的总统助理手中。我的朋友戴维·布鲁斯争辩说，如果我当真要使我们的成就永不磨灭，如果我想留传一点东西而不是仅仅露一手绝招，那么我们就得委于国务院和外事部门的常务官员以更大的职责。布鲁斯提出，只要我从我的白宫办公室里决定一切，那么这一点就做不到。

我原打算在1973年再任职一段时间，直至看到印度

支那实现和平，对工业民主国家提出新的倡议（后来这一年被称之为“欧洲年”），以及巩固新的莫斯科—华盛顿—北京三角关系。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实际上是否能实现我的意图。我们的一切打算不久就被“水门事件”的灭顶之灾淹没了。

于是，我非但没有辞职，反而在提名我为国务卿的听证会上作证。9月22日，首席法官沃伦·伯格——他以一种感人的姿态中断了在欧洲的访问——在白宫东厅主持了我的就职宣誓仪式。在场的还有我的父母和孩子们。我的双亲似乎感到是在做梦：他们几乎难以相信，在被赶出自己的祖国35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居然登上由总统委任的全国最高行政长官的宝座。

尼克松在宣誓仪式上的讲话既敷衍塞责又稀奇古怪。他指出，我的任命从三方面来说都是历史第一：我是归化公民中第一个出任国务卿；我是在任职前访问过北京和莫斯科的第一个国务卿；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个不梳分头的国务卿。他对最后一点还大加发挥了一番，议论没有头发的迪安·腊斯克究竟属于哪一类：“我的理发师非常聪明，他说，‘嗯，总统先生，他没有多少头发，但他仅有的一点点头发是分开的。’”我在答辞中回避了这个吸引人的话题。接着，尼克松马上就离开了，甚至都没有在国宴厅里举行的传统招待会上稍留片刻应酬一下场面。

我接管国务院后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尽管我们的

行政权威每况愈下，但我们还得执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如果历史可资借鉴，危机现已不可避免。每天报纸的头条新闻和新闻广播都在开展诋毁总统的运动，面对这样一种可悲的景象，此时此刻的当务之急是要提醒美国人和我们全世界的朋友：我们的政府仍在发挥作用，意志坚强，并且主宰着一切。

我宣誓刚刚两个星期之后，中东战争就爆发了。

中 东 战 争

1973年10月6日，星期六清晨6时15分，我正在纽约市沃尔多夫塔楼我的套间里睡觉，这里是我每年前来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所使用的总部。突然，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闯进我的卧室，连喊带叫地说，以色列和两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和叙利亚——马上就要开战了。他深信这完全是一个误会；每一方都确实误解了对方的意图。假如我能立即消除它们之间的误解，我就可以在战争打响之前控制局势。这是西斯科对我的能力的恭维。不幸的是，这太过奖了。

两个小时以前，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在耶路撒冷她的办公室里召见了我国大使、前参议员肯尼思·基廷。以色列领导人在这一天照常工作是非同寻常的——这一天是赎罪日，是犹太人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根据传说，在这个神圣的季节里，上帝决定所有凡人在来年的

命运，而赎罪日是这个神圣季节的最高潮。梅厄所宣布的惊人信息是：以色列与命运的遭遇战已经开始。

“我们可能遇到了麻烦”，梅厄对基廷说。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调动，佯称只是军事演习，现已突然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威胁态势。以色列现在相信，埃及和叙利亚将于当天傍晚发动协同进攻。她提出，既然阿拉伯国家肯定要吃败仗，那么危机必定是由于它们误解了以色列的意图而造成的。美国是否能够紧急向苏联和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转告以色列无意进攻的信息？

当西斯科把我叫醒时，中东和平的时间只剩下90分钟了。埃及和叙利亚把它们备战情况伪装得如此巧妙，以至事到如今，以色列还以为它们的进攻要比实际发动的时间晚4个小时才开始。

早上6时40分，我给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打电话。多勃雷宁从床上被叫起来。他声称这个事件必定是以色列耍的花招，旨在为发起先发制人的进攻作辩护。我对他说，我给他打电话的目的是要向他证明情况恰恰相反。他玩弄外交辞令，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如果这样磨蹭下去，在你理解我的意思之前，战争就要打起来了。”

经过一个半小时紧张而忙乱的电话联系后，上午8时15分，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埃及外长穆罕默德·哈桑·扎耶特打来电话声称，以色列部队袭击了苏伊士湾的埃及阵地。14分钟后，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电

话报告说，埃及和叙利亚飞机半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各条战线上进行空袭。大约于中东时间下午 2 时、华盛顿时间上午 8 时进攻就开始了。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国的官僚们才承认战争真的已经爆发了，或者承认战争是由阿拉伯人发动的。这一点在应我的要求于首都召开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当时由国家安全顾问，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组成。）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报告说，根据大马士革电台广播，是以色列首先发动了进攻，对此，科尔比并无异议。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评论说，尽管叙利亚诚实可靠的名声并不太好，以色列**没有**首先发动中东战争，这在 20 年来还是第一次。只有西斯科的帮办艾尔弗雷德·L（罗伊）·艾瑟顿对这种一致的看法表示异议：“在一年中的这一天，他们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来。而且，以色列并没有事前预作准备的任何迹象。”

上午 9 时 20 分，我告诉多勃雷宁，埃及和叙利亚已经发动了突然袭击。但多勃雷宁硬说他听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我厉声回答说：“你和我都知道这是胡扯。如果说战争是由以色列的海军发动进攻而引起的，那么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怎么能在同一分钟沿全线发动进攻呢？”我警告多勃雷宁说，东西方关系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可能付诸东流。